

一、毛澤東誕辰 130 週年與改革開放 45 週年觀察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蔡文軒主稿

- 習以「兩個不能否定」填補並結合毛鄧的理念斷層，將「中國式現代化」視為毛的未竟事業，與中國未來改革開放成敗的關鍵；中共官宣將紀念毛做為擁護習核心的政治符號。
- 習對外揚棄「韜光養晦」，經濟走向以黨領政的管制型治理，企藉制度安排使威權得以存續，開放程度則日益狹窄，其路線是否能挽救中國經濟與習政權的正當性，勢必受到許多考驗。

（一）前言

2023 年恰逢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誕辰 130 週年與中國改革開放 45 週年。在逢五、逢十的文化影響下，今年的紀念活動格外盛大。中共官媒除了稱毛為「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以外，也宣布將舉辦徵文、書法展與學術論壇等活動，並製作多部影劇紀念其人。另一方面，許多報導則是強調當前習近平對中國經濟要持續深化改革開放的意向。對於習的集權現象，學者吳玉山以「再毛化」來形容這位領導人的路線與政策。然而，中國歷經改革開放，當前亦面臨重大的內外部局勢變革，使得習展現出不同於毛澤東的政治作風與治國策略。本文將先討論毛澤東誕辰與改革開放之背景，再進一步分析習時代的改革開放有何特別之處，最後則為結論。

（二）後毛澤東時期與改革開放

近年來，中共官媒少對毛澤東逝世或冥誕的紀念發表相關報導。事實上，這位被視為偉大馬克思主義者與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主席，在習上任後更常被冠以愛國者與民族英雄等稱號。毛在 1976 年 9 月逝世於北京後，便受到中共官方與民間大肆評價。他曾經帶領中共創建新中國，並主張超英趕美，建構中華民族認同的厚實根基；也曾發動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造成十年浩劫中無數生命、文化與傳統的消逝。

接班的鄧小平為了重整社會並鞏固政權，宣布「撥亂反正」。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之起點，正式開啟中國政治改革與經濟開放的大門。在 1981 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鄧更對毛提出「三分過，七分功」的評價，劃定毛的歷史地位，也象徵中國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的成績為後來中國崛起打下了基礎。中共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做為指導方針，透過對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堅持進行經濟建設。首先，從「放權讓利」開始進行國企改革，擴大企業的自主權，也引進類似農村改革中的承包制度，刺激企業的生產動機。第二，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去處。特別是食品加工、民生用品以及手工零件等勞力密集產業，帶動中國經濟成長。第三，經濟特區的制度創新成功吸引外商投資，這種借助出口擴張的策略一來促使國內製造業壯大，另一方面也促使新興資訊與技術的流入。最後，是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緊隨農村改革的步伐，中共開始允許並鼓勵個體經濟建立，這為改革開放注入一股活力，亦推動了創新與就業機會的增長。

在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社會發展出現巨大轉變，這似乎如同鮑彤（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所言，毛澤東之死使得改革出現生機。所謂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的制度。在鄧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將官僚計畫經濟推向市場經濟轉型；在政治上則抹去強人政治的色彩，轉向漸進改革和集體領導。隨著中國於 2001 年「入世」後，融入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並於 2010 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革開放的成效受到證實，似乎也反映出毛的政治遺產與鄧的治國策略之間的衝突。然而，在毛誕辰 130 週年的現今，中國社會似乎又恢復到毛時期的一些現象，其激進的對外政策更在國際上遭到許多批評。

（三）習時代的政策修正

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看來，改革開放確實讓中國經濟快速成長。1978 年，中國 GDP 為 2,185 億美元，到了 2018 年已大幅增長至

13 兆 8,918 億美元。直至今日，中共依然讚嘆其輝煌成就，並立言朝向深化改革開放的方向邁進。然而，習近平時代的國內外情勢和其個人集權對制度的破壞，使中國走上與過去迥異的路徑，即便他承襲了與歷任領導人相同的國家願景。

具體而言，改革開放政策固然富有成效，但挑戰也隨之出現。習時代許多政策的目標導向都旨在解決改革開放的後遺症，這為習採用強勢作風進行社會治理的做法提供了必要性和正當性。例如，強調共同富裕來化解貧富差距與社會流動堵塞的問題；透過修訂《紀律處分條例》，以制度建設來全面從嚴治黨，並大規模拍蠅打虎肅清政治腐敗。這些政策都潛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共同富裕而言，該項政策是以「調節收入」的方式來讓經濟重分配，但這事實上是中共對商業菁英的打壓，引發與民爭利的疑慮。此外，幾年以來的反腐運動已和政治安全掛勾，加上對國安與反間諜的強調，使得外國資本湧現出逃的現象，更不利於中國經濟的成長以及對新興技術的創造。從國際局勢看來，改革開放雖使得中國國力大幅提升，但中共當前對「奮發有為」的實踐卻引發各國憂慮。在與美國正面對決的情況下，習時代的改革開放在本質上已經轉變，和過去有所不同。

進一步比較，鄧時期所提的改革開放，是在「韜光養晦」的外交背景下進行經濟建設，強調中國在全球的融入，該指導方針並延續至江、胡時代。但當前中共所主張的，是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且以政治安全為中心的習近平路線。更加側重的是中國的「自立自強」以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展現，這些相關政策都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與政治安全的要求，最終必須彰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就，這和毛思想中講述的「獨立自主」更為相近，其民族主義的色彩更重。這種對比彰顯了毛鄧兩人的理論差異，也影響了習當前治國理政的方向。舉例來說，中共近來強調訊息、網路安全和科技自主創新，許多省分的政府機關與國有企業傳出禁止職員使用 iPhone 手機，改用本土品牌，這和改革開放主張的經濟自由宗旨有所出入，而更像是毛澤東思想中的自力更生概念；除此之外，從中共對毛的紀念當中也可以看出習對其理念與價值觀的承襲，12 月中旬，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發布一篇紀念毛澤東的文章〈永遠銘記毛澤東同志的豐功偉績和崇高風

範》，當中即臚列了領導核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現代化」與黨的建設等五個部分，來闡述毛的政績，而上述項目都呼應了目前中國的政治現實。

簡言之，現今中共官方的宣傳基調，很大程度將對於毛的紀念做為一種擁護習核心的符號。在習全面掌權下，中國經濟已從市場社會主義走向以黨領政的管制型治理。所謂改革，是透過許多制度安排來使得威權存續；所謂開放，其程度更是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而顯得更為狹窄。

（四）結語

今時不同往日，中國的新局已經出現。鄧時期的改革開放，致力於讓文革後的中國走出毛澤東的陰影，一方面招商引資，積極與世界融合，另一方面抹去個人崇拜，主張集體領導，並賦予毛一定的歷史地位來鞏固中共政權；然而，習近平雖然也多次表示改革開放的決心，但在政治上不斷集權與擴張，甚至在 2021 年底的第三次歷史決議中將自身地位提升，幾乎等同於毛。習似乎運用了類似毛澤東的方式來進行其所謂的改革開放，無法徹底揚棄鄧的政治遺產，但又希望繼承毛的魅力與作風來維繫個人權力定於一尊。習透過「兩個不能否定」的論述來填補並結合前任領導人之間的理念斷層。在 12 月 26 日紀念毛澤東誕辰 130 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習也以較短的篇幅來闡述毛的功績，並以「中國式現代化」貫穿全文，同時將其視為毛的未竟事業，與中國未來改革開放成敗的關鍵。然而，這樣的路線是否能夠挽救中國經濟發展，並使得所謂「中國之治」能爭取人心，並持續習政權在統治上的正當性，勢必仍會受到許多考驗。在毛誕辰 130 週年與改革開放 45 週年的現今，該問題應被置放在中國國家發展的框架中來加以探討，這不僅將涉及兩岸關係的走向，也和國際脈動緊密相關，值得吾人持續關注與探究。

二、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觀察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員王國臣主稿

- 會議提出「先立後破」、「以進促穩」，較往年最完整收錄習近平的重大經濟戰略，惟連兩年未提「共同富裕」。另對民企及外資的重視性有所調降，似擺盪於開放與安全之間。
- 財政政策轉為積極，貨幣政策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產業政策重視人工智慧等戰略產業，首次提出納入非經濟性政策等。
- 首要任務是解決房地產債務風險，惟市場與外資均看淡中國大陸房地產和經濟前景，加劇資金外逃，中共或須接管房企。

（一）前言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本次會議）於 2023 年 12 月 11 至 12 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公報全長 4,708 字，較上年減少（年減）0.3%。如表 1 所示，北京當局首要關注發展，共出現 54 次，且較上年增加（年增）8.0%；另值得關注的是，安全計出現 15 次，年增 50%，顯示中國大陸希冀兼顧經濟成長與國家安全。

相對而言，保、穩與風險各計 25 次、23 次與 9 次，分別年減 16.7%、34.3%與 18.2%；體現「先立後破」與「以進促穩」，經濟目標由消極轉向積極。故取而代之的是改革與科技，分別為 17 次與 10 次，年增 13.3%與 42.9%；惟此立基於內循環，最佳例證為消費倍增至 12 次；反之，開放縮減至 7 次，創 2018 年美中貿易戰以降的次低。

表 1：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關鍵詞

項目類別	單位：次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發展	39	40	41	40	50	54
保	22	35	28	36	30	25
穩	22	29	13	25	35	23
改革	25	28	16	15	15	17
安全	6	1	10	6	10	15
消費	2	4	11	3	6	12
科技	1	6	14	9	7	10
風險	4	8	7	8	11	9
開放	11	10	6	7	8	7

尤以關注的是，本次會議為歷年最完整收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重大經濟戰略，含括雙循環、供給側改革、新型舉國體制、全國統一大市場、新型城鎮化、主體功能區、兩個毫不動搖、高水準制度型開放、「一帶一路」、碳達峰與碳中和，以及科技與產業鏈自主；今年僅未提及共同富裕（見表 2）。

表 2：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習近平若干重大戰略

項目類別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國內與國際雙循環		✓	✓	✓	✓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	✓	✓	✓	✓
科技自立自強		✓		✓	✓
新型舉國體制		✓		✓	✓
產業鏈供應鏈韌性		✓	✓	✓	✓
全國統一大市場					✓
新型城鎮化		✓	✓		✓
主體功能區					✓
碳達峰碳中和		✓	✓	✓	✓
兩個毫不動搖				✓	✓
高水準制度型開放		✓	✓	✓	✓
一帶一路	✓		✓	✓	✓
共同富裕		✓	✓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二）施政目標與工作重點

表 3 匯整本次會議的施政目標。首先，本次會議的總基調仍為穩中求進，連續第 4 年一致。財政政策依舊強調積極，惟由加力提效，改為適度加力與提質增效，預示財政赤字率或突破 3%。貨幣政策延續穩健，但由精準有力，調整為靈活適度與精準有效，隱含工作目標為克服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

其次，工作任務有九，依序為產業創新、擴大內需、體制改革、對外開放、防範風險、三農問題、區域協調、生態環境與社會保障。其中，產業創新由上年的第 2 位躍居首位，標誌因應美國科技封鎖，北京當局需加快科技自主。此外，消費由 70 個字倍增到 142 個字，凸顯短期重點為刺激消費。

第三，上年特闢一段闡述民營經濟與外資的重要性，惟本次會議將民營經濟，整併至體制改革；此舉與國務院頒布《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並增設民營經濟發展局的作為大相逕庭。特別是，外資論述更由上年的 230 個字，折半到 106 個字，隱含北京當局擺盪於開放與安全之間。

表 3：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工作重點

項目類別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總基調	穩字當頭	穩中求進	穩中求進	穩中求進	穩中求進
財政政策	提質增效	提質增效	提升效能	加力提效	適度加力
貨幣政策	靈活適度	靈活精準	靈活適度	精準有力	靈活適度
工作排序					
第 1 位	生態*	科技	企業	內需	產業
第 2 位	三農*	產業	內需	產業	內需
第 3 位	社會*	內需	科技	企業	改革
第 4 位	地產*	改革*	改革*	開放	開放
第 5 位	內需*	開放*	開放*	風險	風險
第 6 位	科技*	三農	區域	三農*	三農
第 7 位	產業*	企業	社會	改革*	區域
第 8 位	改革*	地產	風險	區域*	生態
第 9 位	開放*	生態	生態	生態*	社會

說明：*表示單獨列為一個工作項目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進一步而言，財政政策愈加重要。財政支出由保持必要強度，升級為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財力保障。地方政府債務亦由控制風險，轉為擴大專項債作為資本金。同時，本次會議重提結構性減稅降費。尤以關注的是，轉移支付由加大力度，改為嚴格監管，隱含地方財政權向上緊縮（見表 4）。

表 4：財政政策重點

項目類別	2022 年	2023 年
財政支出	保持必要強度	優化結構與強化重大任務財力保障
地方債	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合理擴大專項債
減稅降費	無	落實結構性減稅降費
轉移支付	加大力度	嚴格監管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貨幣政策則主要延續上年，含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社會融資規模與廣義貨幣供應量（M2）貼近名目經濟增速——M2 年增率預估維持在兩位數，以及人民幣匯率穩定。尤以關注的是，信貸對象由小型微利企業、科技新創與綠色低碳，擴增到數位經濟，且基準利率將繼續調降（見表 5）。

表 5：貨幣政策重點

項目類別	2022 年	2023 年
流動性	合理充裕	合理充裕
社會融資規模	名目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名目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廣義貨幣供應量	名目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名目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人民幣匯率	穩定於均衡水準	穩定於均衡水準
信貸	小微、科創與綠色	小微、科創、綠色與數位經濟
宏觀審慎	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	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產業政策延續強調數位經濟、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生物製造（biological manufacturing）、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ation）與綠色低碳；其中，北京當局未強調平臺經濟，顯示治理整頓暫告段落。本次會議新增兩項重點——商用航空（commercial aviation）與低空經濟（low-altitude economic），並刪除礦產探勘，顯示航天軍工企業的重要性更趨提升（見表 6）。

表 6：產業政策重點

項目類別	2022 年	2023 年
數位經濟	✓	✓
人工智慧	✓	✓
生物製造	✓	✓
量子計算	✓	✓
綠色低碳	✓	✓
商業航空		✓
低空經濟		✓
礦產探勘	✓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最後，本次會議還具有若干新意。一是納入非經濟性政策，特別是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二是確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新機制。三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平急兩用」公

共基礎設施與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其餘依序是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健全社會救助體系，以及建立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

（三）政策意涵

當前中國大陸經濟首要任務，應為解決房地產債務風險。人民銀行與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於 2022 年 11 月發布《關於做好當前金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的通知》（金融 16 條），要求金融機構展延建商還款期限一年。2023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更定調「適時調整優化房地產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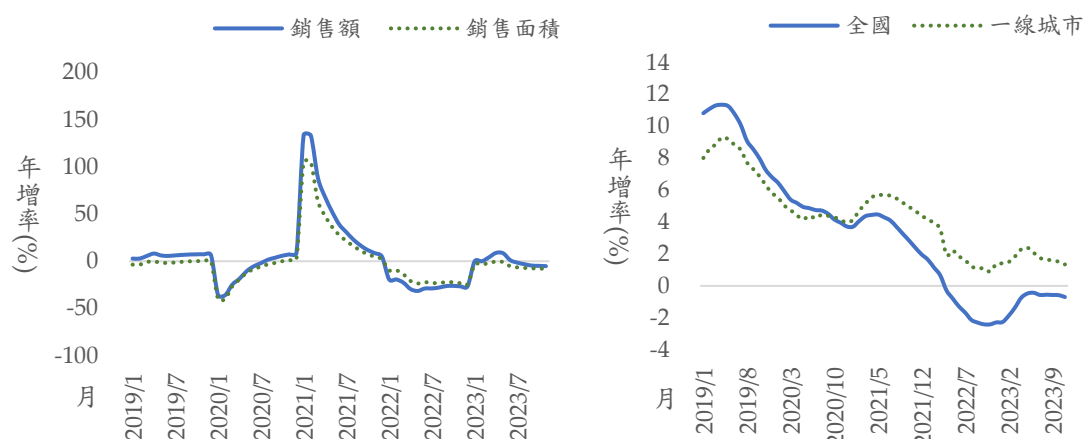
北京當局於 8 月再祭出「認房不認貸」，即家庭成員名下無住房，無論是否曾經申請房貸，皆可享有首次房貸優惠利率。人民銀行再頒布《調整優化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與《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貸款利率》，首付比率由 40% 折半到 20%，並下調首貸利率 0.10 個百分點，標誌全面解禁「限貸令」。

廣東、遼寧、浙江、江蘇、甘肅與山東亦相繼取消「限購令」，即每戶只能新購一套商品房。此舉獲得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旗下《中國房地產報》的追認——放寬境外機構與個人購買住宅的數量。尤以關注的是，《彭博社》（Bloomberg）更揭露，監管機關已擬定 50 家建商白名單，將給予其充分的融資支持。

問題是，前 11 個月商品房銷售額年減 5.2%，連續 5 個月負成長。需求頹靡拉低房價，70 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價年增率年減 0.7%，較 8 月房市新政再下降 0.1 個百分點；其中，一線城市滑落 0.4 個百分點，最為嚴峻。二線與三線城市亦同步放緩 0.2 個百分點。易言之，民眾看衰房地產政策（見圖 1）。

房市銷售寒冬，加劇建商經營困難。銷售前 20 大建商的營業利潤，由 2019 年上半年的 2,917 億人民幣，銳減到 2023 年上半年的 635 億人民幣，跌幅高達 78.2%；其中，碧桂園、融創中國、華夏幸福、世茂與金科則虧損 471 億人民幣，並誘發債務違約。建商信用破產，又削減民眾購屋意願；中國大陸深陷惡性循環當中。

圖 1：中國大陸房地產銷售情勢（2019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



房市風暴疊加金融國安化，更嚇跑外資。2023 年 8 月，外資拋售 1,078 億人民幣的中國大陸債券。滬港通與深港通的北上資金，亦流出 897 億人民幣。或肇因於金融部門的強力干預，後續三個月的資本外逃（capital flight）方逐步趨緩。惟若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則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IF）預估，2024 年還將撤資 450 億美元。

準此，21 家國際組織與跨國金融機構預期，2023 年經濟成長率介於 5.0%至 5.5%，平均 5.2%，略高於政府預定目標（5.0%）。惟預測值較年內高點下修 0.5 個百分點，調降家數比率高達 85.7%。尤其是，2024 年經濟成長率預期均值為 4.6%，較 2023 年預期均值減緩 0.6 個百分點，顯示法人機構看衰中國大陸經濟前景（見表 7）。

表 7：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預期

單位：年增率(%)、百分點

項目類別	預測時間	2023 年	調整幅度	2024 年
經濟學人(EIU)	12/1	5.5	-0.6	4.9
荷蘭國際(ING)	12/5	5.4	-0.3	5.0
國際貨幣基金(IMF)	11/7	5.4	0.2	4.6
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	11/28	5.4	-0.1	4.6
花旗(Citibank)	11/2	5.3	-0.8	4.6
高盛(Goldman Sachs)	11/14	5.3	-0.7	4.8
惠譽(Fitch)	12/13	5.3	-0.5	4.6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11/29	5.2	-0.2	4.7
大華銀行(UOB)	12/1	5.2	-0.4	4.5
IHS Markit	11/15	5.2	-0.3	4.7

匯豐 (HSBC)	11/20	5.2	-1.1	4.9
亞洲開發銀行(ADB)	12/13	5.2	0.2	4.5
世界銀行(World Bank)	12/15	5.2	-0.4	4.5
德國商銀(Commerz Bank)	11/10	5.1	-0.7	4.0
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	12/7	5.1	-0.6	4.2
巴克萊(Barclays)	11/16	5.1	-0.5	4.4
摩根大通(Morgan Chase)	12/27	5.0	-1.4	4.9
瑞士聯合銀行(UBS)	11/22	5.0	-0.7	4.5
星展銀行(DBS)	12/11	5.0	-0.5	4.5
穆迪(Moody's)	12/5	5.0	0.0	4.0
加拿大國銀(NBC)	11/20	5.0	-0.3	4.5
平均		5.2	-0.5	4.6

說明：調幅為最新值與年內最高值差距

(四) 結語

中共當局深刻意識經濟情勢愈趨嚴峻，本次會議將需求收縮，轉為有效需求不足，且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供給衝擊轉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預期轉弱轉為預期偏弱。尤其是，中國大陸政府將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轉為風險隱患仍然較多，並提升到主要問題，顯示房地產調控將為重中之重。

具體而言，當務之急為明確建商債務解決方案——予以破產或政府接管。惟放任破產，恐引爆系統性金融風暴。例如：17 家國有與股份制（國股）銀行的房企不良貸款（non-performing loan, NPL）計 3,675 億人民幣，保險資金注入投資性房地產 1 兆人民幣，1,215 億人民幣的涉房信託。易言之，北京當局只有接管一途。

惟目前爛尾樓高達 3.2 兆人民幣，且僅前五家建商負債就逼近 8 兆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大陸財政收入的四倍。對此，人民銀行迄今僅提出 3,800 億人民幣的房企紓困專項再貸款、保交樓與租賃住房貸款支持計畫；無疑是杯水車薪。準此，中國大陸房市風險預期持續攀升，並成為全球經濟首要不穩定因素。

三、「拜習會」後美中互動情形觀察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宏仁主稿

- 「拜習會」達成恢復先前中斷的軍事聯繫的協議，旨在減少事件或誤判升級為危機的風險，但是中國在軍事對抗上並沒有做出對於美國的實際讓步，例如當前的南海衝突。
- 「拜習會」中重點討論了臺灣問題，美國表達對臺灣防禦的支持以及中國對臺介選的關切。
- 經濟問題是會談重點之一，雙方討論了全球經濟復甦和技術進步問題。此外，在打擊芬太尼 (fentanyl) 生產方面美國先在峰會之後先將中國公安部法醫學研究所 (IFS) 移出制裁的實體清單，但是中國政府方面迄無任何具體的回應措施。

(一) 前言

在今年的 APEC 峰會期間，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達成恢復軍事聯繫的協議，這一舉措原本被視為緩和美中緊張關係的可能開端。然而，這項協議的實際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中國新任國防部長的狀況不明，這對於進一步的軍事溝通構成障礙。其次，美國介入南海仁愛礁附近菲律賓與中國的衝突，這顯示出美國在區域安全問題的積極立場，而在事態的發展上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在軍事上對抗美國的堅持，使得南海問題成為潛在的緊張點。

在臺灣問題上，美中立場明顯對立。美國國會剛通過的 2024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為臺灣軍隊提供全面性培訓計劃，這一措施凸顯了美國兩黨對臺灣防禦的共同支持。相對地，中國則堅持其對臺灣的主權立場，並持續對臺灣明年的總統大選進行干涉，例如，中國政府在臺灣大選倒數不到 1 個月前，便由商務部在 12 月 15 日公告宣布「臺灣地區對大陸貿易限制措施構成貿易壁壘」，作為一種嚇阻手段。這些動作顯示美中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分歧顯著，且缺乏任何交集或共識的跡象。

經濟問題也是「拜習會」重點之一，雙方討論了全球經濟復甦和

技術進步的問題，但中國政府面臨的經濟挑戰不容忽視。近期，穆迪（Moody's）將中國的信用評級展望調降至「負面」，這反映了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擔憂。此外，美國對於芬太尼問題的態度變化也值得關注，美國將中國公安部法醫學研究所從制裁名單中移除，表明美國在特定議題上尋求與中國的合作。然而，中國政府對此尚未做出明確的回應。總體來看，雖然舊金山「拜習會」就一些問題進行了交流，但在關鍵問題上，如南海、臺灣問題以及經濟合作等方面，雙方仍存在顯著的分歧。這些分歧在未來可能對兩國關係產生更深遠的結構對抗影響。

（二）「拜習會」後尚未完全落實共識，美中衝突結構仍持續

在 2023 年 11 月 15 日舉行的舊金山「拜習會」中，拜登和習近平達成了重新開啟軍事溝通的共識。這項協議旨在降低美中間的緊張情勢，並避免誤解與誤判導致衝突；然而，這種溝通機制在實際上是否能有效減緩南海的軍事對峙和潛在衝突仍存在疑問。從近期事件來看，美中在南海的軍事對抗並未因為這次峰會的協議而有所緩解。例如，最近有報導指出，美國海軍船艦在南海執行常規任務時，被中國軍方指控非法進入其所聲稱的領土水域，包括第二托馬斯礁（Renai Reef）附近的水域。此外，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海域也出現了數次對峙，並且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近期也因為發現中國海軍民兵船隻數量在其專屬經濟區內顯著增加而部署了船隻。這些事件反映出南海地區的緊張情勢持續升高，「拜習會」雖達成了某種程度的溝通協議，但在實際軍事行動上，雙方似乎仍然堅持各自的立場。

就臺灣議題方面，「拜習會」曾進行了激烈討論。美方對中國圍繞臺灣的大規模軍事擴張表示關切，並要求中方尊重臺灣的選舉過程。峰會期間，雙方也就其他包括軍事和貿易關係在內的議題進行了討論，表現出為美中雙邊關係帶來穩定性的意願。在會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通電話，討論了美中兩國元首峰會中達成共識的實施事宜。這次通話再次強調了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要求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不支持或縱容任何臺獨勢力。然而，

美方在簡短的立場聲明中並未提及臺灣問題，顯示中國對於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共識只有片面的認知，而美國政府並未認同中方的這一觀點。

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 2024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中明確要求加強美臺軍事合作。這項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長與臺灣官員協商，為臺灣軍隊制定全面的培訓、諮詢與制度性能力建設計劃，並要求這項計劃使臺灣軍隊能夠進行分層防禦，包括支持不對稱防禦戰略、加強美臺軍隊互通性、鼓勵美臺軍隊資訊共享，並加強專業軍事教育與文官對軍隊的控制。綜合來看，儘管「拜習會」對臺灣問題進行了討論，但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依然存在顯著差異。美國通過國防授權法案的行動表明，其對臺灣的支持並未因中方的要求而有所改變，並且美方沒有在與中方的後續溝通中配合中方的政策基調，這也反映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獨立立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拜登特別向中國提出加強打擊芬太尼的請求。為了說服中國加強合作，拜登政府準備解除對中國法醫科學研究所的限制，這是為了幫助阻止合成鴉片類藥物芬太尼流入美國。不過，根據報導，中國在這方面的回應似乎不夠積極，僅在 12 月 7 日召開了「全國禁毒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會議內容著重於彰顯公安部在打擊毒品方面的成果，而非針對美國提出的芬太尼問題的具體回應。同時，美國對中國的高科技制裁政策依舊堅定。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國防論壇上發表談話，強調阻止中國獲得先進的人工智能晶片的必要性，和與 GPU 和 AI 晶片製造商的合作，以保護這些尖端技術不落入中國手中，並警告對那些試圖規避技術制裁的公司將會受到控制。

在經濟方面，中國目前面臨諸多挑戰。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將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主要原因是經濟放緩和債務負擔過重。中國目前的債務水平高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300%，並且存在潛在的 11 兆美元的隱形債務。這反映了中國經濟面臨的財政、經濟和制度上的挑戰，並指出中央政府和國有企業可能需要為經濟困難地區提供財政支援。中國同時也面臨房地產危機、較弱省分的債務危機，以及整體經濟放緩的問題。穆迪預計 2024 年和 2025 年中國的

GDP 增長率將為 4%，而中國財政部則更樂觀地預計 2023 年經濟增長將達到 5%。

總體來看，美國對於中國的一些要求，如加強打擊芬太尼的行動，目前尚未見到中國的具體回應。與此同時，美國在高科技制裁方面的立場依然堅定，並未因為 APEC 峰會的會談而有所鬆動。此外，中國自身的經濟狀況也面臨多方面的挑戰，包括債務過重和經濟放緩，這些因素都可能影響到中國未來的經濟和國際關係。

（三）後續觀察重點

「拜習會」後，有幾個關鍵項目需要持續觀察：

1. 中國對 2024 年臺灣總統大選的干預：近期報導顯示，共軍在臺灣周邊地區的活動加劇，包括數次接近臺灣敏感區域的行動，這被視為對選民的恐嚇和干預手段。
2. 南海的緊張情勢：中國與美國或菲律賓在南海的對峙可能會增加，這需要進一步關注。共軍是否會在其他地區（如南太平洋島國）進行戰略部署也是一個潛在的焦點。
3. 美國學者對臺灣問題的看法：一些美國學者在重要的外交事務期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政府對中國進行「再保證」，強調美國不支持臺灣獨立和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的立場。臺灣在面對這些國際輿論時，需要考慮如何在選後通過國際媒體加強其立場的宣傳。
4. 中日韓領袖峰會：2024 年初將舉行的中日韓領袖峰會是另一項值得關注的事件，尤其是中國可能利用此會議來分化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從而增強與美國的談判籌碼。

（四）結語

「拜習會」之後雙方在恢復軍事溝通方面的缺乏進展，儘管有初步協議，表明中國在戰略上仍然保持謹慎。這可能意味著這種高層會議在短期內實現具體成果的有效性有限。此外，隨著中國在南海對菲律賓施加壓力的不斷增加，加上未解決的臺灣問題，對美國來說，平衡對地區盟友的承諾和與中國的關係將是一個複雜的挑戰。對臺灣而

言，臺灣的安全和外交地位與美國和中國如何管理它們的戰略競爭和分歧密切相關，但是絕不代表臺灣只能被動地由兩大國操控。美國拜登政府已經提升對臺灣防禦的承諾以及臺美關係，臺灣需要謹慎地進行外交操作，避免美國將來因為國內政治的變化或是政權的更迭，而減少對臺灣的支持力度。

四、歐中峰會與近期雙邊關係觀察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蔚芳主稿

- 年來歐盟領導層和官員密集訪中，惟歐中關係未顯著升溫，峰會前傳出歐方不期望有實質成果、會後不會有聯合聲明。
- 歐方不滿中方助俄規避制裁、歐中貿易逆差快速增長，表達對以哈衝突和臺海議題的關切，中方未讓步，惟雙方有默契避免關係惡化。
- 歐盟仍將中國定調為體制對手，惟未放棄視為夥伴；歐盟內部對與中去風險化議程仍有分歧，中國藉分而治之爭取與歐交往的空間。

（一）前言

2023 年 12 月 7 日與 8 日歐盟與中國大陸於北京展開第 24 屆歐中峰會，這也是雙方自 2019 年以來首次以實體進行的峰會，歐方由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瑞爾（Josep Borrel）代表出席，中方則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出席。早在此次峰會舉行前幾日，歐方便傳出消息指出歐盟將利用此次實體峰會的機會與中國就俄烏戰爭、歐中貿易、中東局勢等議題進行充分討論，但是不期望此次峰會會有實質成果，會後不會有聯合聲明，導致此次峰會仍未召開時氛圍已經相當詭譎。

馮德萊恩曾於 2023 年 11 月會見各國駐歐盟大使時表示，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是影響歐盟未來經濟發展和安全的決定性因素，因此與中國打交道需要保持戰略穩定性；她也強調歐中在許多全球性議題仍有合作空間，因此歐中的競爭關係可以是建設性的，不必然是敵對的。為了尋求進一步溝通的機會，今年以來，除了歐盟領導層，執委會負責不同政策領域的官員也密集訪中，就經濟、數位、氣候、人權和戰略等議題進行高層對話，不過密集的高層對話並未使歐中關係顯著升溫，尤其是歐盟已多次抱怨歐中貿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對市場的不當補貼導致歐盟對中貿易存在嚴重逆差，也造成歐盟採取反制措施，例如於 2023 年 10 月宣布針對中國電動車產業進行反補貼調查，另也表示將考慮對中國風電產業提起反補貼調查，或是利

用補貼、提高關稅等方式保護歐盟光電產業。

（二）歐中就俄烏戰爭、雙邊貿易、中東和臺海等議題對話

在俄烏戰爭議題上，歐盟向中國表達對中俄關係趨近的疑慮，並且要求中國不向俄羅斯提供用於烏克蘭戰爭的致命武器，不向俄羅斯出口軍民兩用物品，以及避免幫助俄羅斯規避來自歐盟制裁。根據歐盟內部估計，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所使用的高科技進口產品，有 70% 來自中國進口，因此歐盟利用此次峰會向中國提交一份中國企業違反歐美對俄羅斯制裁的名單，指出有 13 家中國企業被指控幫助俄羅斯規避來自歐美的制裁，歐盟並警告北京若不採取行動，這些企業可能被列入歐盟後續的制裁名單中。另外，歐盟對於中國於俄烏戰爭後擴大和俄羅斯經濟和戰略互動，或是附和俄羅斯對俄烏戰爭性質與合法性的說法，以及未能積極努力促成和談等問題也感到不滿。雖然雙方對於這些問題無法形成共識，中國也不可能明確承諾歐方所期待的立場，不過從本月 18 日歐盟通過第 12 輪對俄羅斯制裁的內容來看，此前提及的中國企業未在制裁名單中，可見雙方對此仍有一些默契，以避免歐中關係進一步惡化。

在經貿議題上，雙方也在峰會針對歐中結構性貿易失衡進行交鋒。2022 年歐盟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 4,000 億歐元，創歷史新高，是 2019 年 1,800 億歐元的兩倍，貿易逆差快速增長引起歐盟強烈不安，並將此歸咎於中國對某些產業大規模補貼以及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具體而言，歐盟批評歐中存在市場進入不對稱、中國市場政策與經營環境不夠透明、不當的補貼和關稅壁壘等問題，另外，歐盟企業在中國仍然時常被要求提供關鍵經營數據、轉移技術以及智慧財產權不受保障等困境。歐盟也在峰會向中方抱怨中國透過刺激出口，向歐洲市場傾銷中國低價產品來解決國內經濟低迷和產能過剩的做法，會使歐中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中國則表達對歐盟去風險措施可能對中國經濟和技術革新造成衝擊的擔憂。

在以哈戰爭立場上，歐盟向中國重申譴責哈瑪斯對以色列進行恐怖攻擊，重申以色列自衛權，中方並未附和，並且重申對巴勒斯坦的

支持。雖然中國不可能附和西方或以色列，不過雙方都同意向戰區弱勢群體提供人道援助，也都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基於「兩國方案」進行政治和平進程。

針對臺灣問題，雖然沒有新的外交語言或表態，但是歐盟在峰會期間再次向北京表達對臺海緊張局勢升高的關切，質疑北京對改變臺海現狀的意圖，警告北京不要以武力改變臺海現狀。可以說歐盟在峰會的外交姿態一如往常，不選擇在峰會和北京就臺灣議題針鋒相對，不過仍然會透過會員國或歐洲議會官員議員訪臺的方式來表達對臺灣的友好與支持。另外，歐盟針對新疆、西藏、香港等地人權情勢向北京施壓，北京自然不會讓步。

（三）結語

大體而言，歐中關係當前發展仍然延續歐盟 2019 年以來將中國定調為體制對手的基調，馮德萊恩在其任內也多次提到由於中國正在推動另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這是一個不穩定因素，因此如何減少與中國交往的風險，包括減少對中國市場和關鍵產業的依賴，以建立更平衡的關係，是歐盟目前處理對中關係的主要考慮。歐盟仍未放棄將中國視為夥伴，也多次表示雙方仍有空間定義共同的規則和解決方案來應對共同挑戰，不過去風險化的呼聲與必要性已經變得越來越緊迫。根據歐洲中央銀行近期一份調查報告指出，有 42% 在中國的歐盟跨國企業在未來五年可能將部份供應鏈轉移到「友好」的國家，有三分之二歐盟企業認為北京是供應鏈安全的潛在不穩定因素，尤其是疫情期間北京與地方政府的封控政策，讓歐洲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不確定性更加感到不安。

然而，由於歐盟會員國對於去風險化議程的立場仍不一致，主要是因為歐洲各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不同，受到去風險化議程的衝擊也各有不同，這會增加歐盟形成共同戰略立場的複雜性與困難度。例如德國和一些中歐國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仍然十分密切，德國汽車龍頭製造商 Benz 和 BMW 於 12 月初宣布將合資在中國推動超級充電網絡，預計 2026 年以前在中國設立 1,000 個充電站以及 7,000 個充電

樁；另一方面，南歐國家與中國關係就較為緊張，例如義大利正式宣布退出「一帶一路」，兩國協議將在 2024 年 3 月失效，一方面有來自盟國的壓力，不想再當中國「帶路」倡議的宣傳樣板，另一方面也與過去幾年中義貿易額大幅降低，以及貿易赤字居高不下有關。

由於歐盟內部對於如何進行與中國的去風險化議程上仍有分歧，現階段更不可能尋求與中國市場或技術脫鉤。面對歐盟內部的分歧，中國仍會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來爭取與歐交往的空間，例如為了緩和與歐洲的關係，中國在 12 月 1 日宣布向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和西班牙等五個歐盟會員國提供 15 天旅遊免簽待遇，也取消大部分對立陶宛的貿易制裁，雖然這些看似友好的舉措並不足以扭轉由於結構性貿易失衡以及中俄關係趨近而持續低迷的歐中關係，但是只要歐洲在對中關係無法團結戰略立場，中國就可能找到分化歐洲的破口。

相比峰會召開前的詭譎氛圍，實際會議召開後雙方會談氛圍相對友好，沒有激烈的言詞辯論或觀點衝突，也都保持溝通的空間和對話的可能性，這可能是由於雙方目前都面臨一些經濟困境，歐盟由於疫情和俄烏戰爭造成財政支出和通膨居高不下，中國則有房地產泡沫危機、青年人口就業困難和通貨緊縮等壓力，因此緩和關係並尋求共識是更為理想的做法。博瑞爾曾將 2022 年的歐中峰會稱為是「聾人的對話」，2023 年的峰會相較而言雙方有更多對話和更廣泛的議題討論，但是仍然缺乏有意義的結論或重大突破，許多有爭議的議題還是懸而未決，可以說在結構性問題（主要是俄烏戰爭與不公平貿易競爭）未能得到解決以前，雖然雙方仍有可能就一些全球性議題（例如氣候變遷）達成合作意向，或是在敏感性較低的議題領域進行對話或開放交往（例如人文往來或高層次人文對話），但是對實際改善歐中關係的影響相當有限。

五、近期中日韓互動情形觀察

中興大學國政所助理教授盧信吉主稿

- 中日韓的互動關係與順序，在韓、日外交選項中位居美韓、美日之後；韓日內部反中民意高漲、政府支持度偏低，將傾向以安全議題為優先，對中強硬。
- 過去中日韓峰會未能就應對北韓威脅達成共識，遑論涉及更精密技術與科技的太空政策，北韓威脅將成為更大挑戰。
- 美中各自因內部選舉與經濟問題，提供中日韓關係可緩慢調整的空間，未來美中關係就定位後，中日韓才有可能繼續談判。

（一）前言

2023 年 11 月 26 日中日韓三國外長峰會於韓國釜山舉行，分別由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日本外務大臣上川陽子及南韓外長朴振代表參加，這是經歷疫情考驗後睽違 4 年 3 個月來的再次舉行。會中釋放多項正面訊息，包含同意加快辦理三國領導人會談的相關事宜，並在安全、經貿及科技等領域加強合作。從東協加三框架底下的「早餐會」開始，到 2008 年後為因應金融海嘯而脫離框架，讓做為區域發展主要動力的三國峰會備受注目。然而，看似與當前東北亞發展格局不同的中日韓峰會如何調整轉型，繼而成為未來持續發揮影響力的機制，必須要從當前結構下不可避免的美中對峙格局開始談起。

（二）近期中日韓關係發展

2023 年 7 月 19 日，韓國總統尹錫悅（Yoon Suk Yeol）創下新的歷史紀錄，成為首位登上美軍戰略核潛艦的盟國元首，與尹錫悅總統在 2022 年 11 月的韓國—東協峰會，和其後在東亞峰會上闡明韓國以「自由、和平、繁榮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為藍圖的獨立印度太平洋戰略規劃相同，論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反對依靠力量改變現狀」的承諾，成為韓國跨入當代「印太戰略」的具體措施。約莫同一時間（2022 年 12 月），日本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政府批准新修訂的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備計畫》，讓日本協作東亞區域安全保障的方案更具體化，並成為落實美國東亞戰略的執行者。在美國協調下，三國於 2023 年 8 月在大衛營（Camp David）舉行歷史性會晤，促成當前美日韓聯盟的契機，一舉改善了韓日間因貿易問題而齟齬難成的外交關係，不啻為當前東亞局勢相對穩定的最主要關鍵發展，也成為美國東亞戰略的基本力量。

相對而言，近期中韓關係、中日關係陷入低潮。近期首爾因為尹政府對於臺灣議題表態而與北京陷入僵持，「反對以武力改變臺海現狀，臺灣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一席話直觸北京外交紅線，讓短期內中韓關係未見改善契機；後者雖於 2023 年迎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5 週年，只是當前未有共同戰略利益讓雙方漸行漸遠，過去的歷史事件與臺灣問題也沒有更新的解決方案，加上日本配合美國晶片的制裁法案，讓東京與北京的關係沒有轉圜餘地。因此，中日韓的互動關係與順序，於韓、日兩國的外交選項中位居美韓、美日之後，中日韓外長會議後亦未見相關改善的跡象，難以期待三國領導人峰會會有更新一步發展，更甚者三國領導人峰會或將難以舉辦。

（三）重建中日韓互動模式是三國重要課題

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中日韓峰的互動以經濟、貿易面向為主，讓中日韓以推動三國 FTA（Free Trade Agreement）為目標，替三國合作提供動能，讓各領域合作項目均獲得實質之進展，並期望藉由三國合作之效益外溢到政治、安全事務。相關方案一旦成形，將提供巨大經濟影響力並引領亞洲朝向中國為主導的發展方向前進，由中國市場為主導的市場話語權將改變當前以西方社會為主的狀態。只是對於當前的韓、日社會而言，對於中國的嫌惡程度在近年都呈現相對高漲的狀態，一旦在社會結構中民眾對於中國的厭惡程度超越其他國家時，會對處於民主運作機制底下的執政團隊形成一個新形態壓力。且當前韓、日兩國執政團隊並非獲得高度支持之優勢，將使得中國因素成為一個適宜操作的政治話題，「抗中」成為一個可以「理性」的選項。

其次，檢視地緣政治理論者對於東亞區域的論述能夠發現，韓國

與日本同屬美中戰略衝突邊緣地帶的國家，從戰略發展目標的設定中，經常面臨相同的假設與選項。當中國不斷以固有疆域為理由侵擾近代國際法建構出來的當代國際社會體系，也成為當前韓日國家安全議題中最為顧忌的部分。彼此之間對於這樣的安全議題並沒有妥適的解決方案，都成為韓、日社會退回最為保守基本立場的主要理由。當前中日韓外長會議基於彼此之間內部治理的轉換期，或許在安撫在野選民的當下有舉行的必要性，只是當面臨執政保衛的壓力時，各政黨陣營只能被迫強硬，這是美中「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狀態下的不同對象呈現，中國因素讓「國家安全」成為燙手山芋的議題，成為韓、日社會被迫迎戰的困境。

因此，中國在本次的中日韓外長會議中，或許除了強調對於當前局勢(疫後經濟、科技管制、自由貿易)的改變與影響外，更需要的是重建區域與中國之間的互動模式。包含對於區域內發展的認知與共識，以及解決當前美中競合困境的方法。

(四) 北韓核威脅議題對中日韓形成更大挑戰

韓國媒體 2023 年年初以模擬情境的方式，推估在下列韓國民眾經常出沒的地點中遇到不同情況的核武攻擊，將遭受何種程度的傷害。包含北韓政權以「先發制人核攻擊」向龍山總統室辦公樓發射了 10 千噸級破壞力的低威力核導彈，將造成 31 萬人死傷，直接死亡人數約為 5 萬人；或北韓在首爾爆破威力為 20 千噸的核彈頭，將造成 42 萬多人受傷，直接死亡人數約為 11 萬多人；或於首爾光化門廣場引爆核彈，在北韓現有最大核威脅 100 千噸的攻擊下，將造成 192 萬人以上死傷，直接死亡人數約為 34 萬人。然而，聚焦於武力政策的平壤政權更於 2023 年 9 月，透過北韓中央通信社(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CNA)報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DPRK)已將核武政策建構列為國家憲法，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藐視」，這是北韓政府一年前於最高人民會議將國家在受到入侵或被判斷即將遭到攻擊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核武的危機時刻寫入法律後，再一次將核武政策明文放入法律之中，而且是國內法律最高位階的憲

法，相關具體作為除了說明北韓政府能夠熟稔使用核武之外，更說明其認知到法律適用以及正當性的問題。

但平壤政權並未滿足於可能的「實質擁核」，更於 2023 年年末宣稱成功發射衛星，雖然如同過去一般尚未獲得確切證據，但代表著朝鮮半島在核武困境下，再有太空困擾。一向特別著重於應對北韓威脅的韓國國家安全議題，或許需要將軍事面向的需求納入到太空政策目標，這將使得應對北韓威脅進化到新一階段。過去的中日韓峰會並未能就應對北韓威脅達成共識，事涉更為高度精密技術與科技的太空政策將更難形成三國共識，北韓威脅未來將成為更大挑戰。

（五）結語

總結而言，當前的東北亞格局未能提供中日韓三國峰會（不論是何種層級的會晤）一個合適的發展動能。在當前錯綜複雜的東北亞外交關係中，美中各自因為國內選舉與經濟治理的問題，未能將其外交政策的成果推展到極致的必要，這也讓當前中日韓關係可以「緩慢」調整。對於中日韓而言，等待美中關係就定位後，才有可能繼續談判的新進展。除非，2024 大選年重要的國家選舉結果「出乎意料」，或者「麻煩製造者」北韓突襲穩定的安全結構，否則近期中日韓互動關係的改變將只是短期波動的呈現。

六、中共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簡析

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王韻主稿

- 習近平 2002 年調任浙江後立即赴楓橋調研，執政後汲取「楓橋經驗」的「群眾鬥群眾」監督機制，結合科技和志願者推動警民合作的「維穩 2.0」，體現習時期權力集中以及凡是講求「底線意識」的政治思維。
- 「新時代楓橋經驗」無工作手法與策略上真正的創新，僅推廣力度與投入資源大幅增加，卻成效不彰，在疫情期間引發大量民怨，無法有效進行封控管理，也不可能永遠壓制人民要溫飽、要公道的普遍需求。

（一）前言

今年是 1963 年毛澤東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的 60 週年，11 月 6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帶領中央紀委書記李希、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公安部長王小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等一群中共最高級別的政法系統官員，先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與來自全國的「楓橋式工作法」表現優良的入選代表，同一天隨即召開「紀念毛澤東同志批示學習推廣『楓橋經驗』60 週年暨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發展『楓橋經驗』20 週年大會」，誓言要在全國加強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陳文清強調「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工作重點，在於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關鍵字是「預防、調解、法治、基層」，要利用以上的原則把各式「矛盾」（人民不聽話的代名詞）「就地解決」，目標是實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¹。

之後央視、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官媒皆連續多天大篇幅報導這一些活動，在央視製作的影片中，旁白措辭嚴厲地提醒眾人：「毛澤東還對有關部門負責人，說了這樣一段話，群眾起來後，做的並不比你們差」。「新時代楓橋經驗」一詞，成為在 2023 年即將邁入尾聲的苦

¹ 「中共政法委書記：發展楓橋經驗 創造穩定環境」，《中央社》（2023/11/8）。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311080049.aspx>。

寒冬季時刻，中國共產黨送給所有幹部與人民的「大禮」；可以合理地預測，2024 年必然有一連串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名的推廣、評比、選拔等政治教育，以及利用「群眾維穩」為手段的各式檢舉、罰款、搔擾甚至是非法羈押等活動。

（二）矛盾不上交、抓人不用上報？

這裡標榜「群眾相互維穩」的「楓橋經驗」，起源於 1963 年在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縣（今諸暨市）楓橋區產生出來的一種依靠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四類反革命分子」的模式，但宣傳中所謂「就地化解矛盾，堅持矛盾不上交」、「捕人少，治安好」的這個「楓橋模式」，它的歷史實踐並不是一個尊重地方差異性（就地監督）或對異議份子寬大（捕人少）的政策；相反的，這是毛澤東「群眾鬥爭路線」的一個延續與修正，目的是要利用諸如「群眾鬥群眾」的這種大規模政治運動的手段，更積極地抓出各式各樣潛藏的破壞行為和潛在破壞活動的「壞份子」，同時還要用其中「群眾監督」的機制，更有效率地去反制地方幹部在執行艱難政策時會「消極應付」、「推諉扯皮」、「敷衍塞責」、「懶政怠政」等常見的官僚弊病²。

「楓橋經驗」強調「矛盾不上交」，來自毛澤東當年積極進行土地改革、反右、社會主義改造、與大躍進政策時抓與殺了太多人，造成經濟生產力不振與社會不穩定的問題，例如楓橋所在地的富庶江浙地區在革命前本來就沒有存在太多的「大地主」與「富農」，革命肅清多年之後也幾乎找不到殘存下來的「反革命」、「右派」或「壞份子」³，但中央「地富反右壞」改造政策下來，地方政府又必須拿出成

² 李希，「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征程上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工作報告」，《新華社》，2023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3/content_5743015.htm

³ 馬克斯教條與中共宣傳中多以佃農經濟描述中國地方的社會基礎，把貧困老實的佃農階級與凶惡的「封建地主」或「富農」階級對立起來，從 1927 年初毛澤東在湖南發動農民起義時就以「打土豪分田地」為號召，暴力「土改」與針對「土豪劣紳」的政治清算，已經成為中共號召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金字招牌」，毛式革命習慣用「一刀切」的手法進行土改。例如革命即將成功的前夕的 1948 年 2 月，毛澤東發布《新解放區土地改革要點》，規定將「土改」打擊對象定為鄉村「戶數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但中共自己西北局研究室和陝西省委調查就指出，整個關中地區，「地主占農村戶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農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共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兩

績，所以只能搞「一刀切」、強迫指定一定比例的人口出來擔當罪名，而這種大規模莫須有罪名的政治迫害，當然會造成基層生產力的低落與民眾的反彈；而楓橋之所以難能可貴而被最高領導人注意到，就是當時農村正在進行毛澤東交辦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四清運動」，意圖以「反修防修」之名壓制大躍進失敗之後民眾與幹部的反彈，而一個小小的地方官居然膽敢「不體察上意」，堅持當地沒有這麼多人需要被改造、就算是要改造也可以透過鄰里來進行，不用動用國家的監獄和解放軍行刑隊⁴。

這種現象跟過去疫情期間，因為堅持「動態清零」造成中國經濟不振的時空背景有異曲同工之處，1960年代當時的楓橋，雖然中央公開說要對四類分子採取「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捉」的方針，但大部分地方在具體推行中，依然採用定指標、「關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簡單粗暴做法；而2020到2022年的中國，雖然中央公開說要「動態」檢討清零政策，要「科學精準」與在地化地處理潛在染疫人口的風險，但實踐上多數省市仍然採取「寧可錯殺一百、不願放過一人」的絕對社會清零方針⁵，這些都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矛盾的一種體現，在地方幹部因為深怕犯錯而凡是「層層加碼」的威權治理慣性之下，選擇「包庇」（假裝看不到違法行為）或是「一刀切」（人為決定必須被處分的人口比例）成為唯二合理的選擇，而選擇「楓橋」（不包庇但也不一刀切），並竟是其中少數的少數，

楓橋在當時的說法是他們透過基層組織發動群眾，對存在「地富反壞」份子進行「評審和說理」，由群眾「監督改造」，因此可以不把矛盾問題上交。雖然缺乏資料佐證，可能是當時中央領導幹部已經察覺到經濟與社會情勢不妙，因此把楓橋區這個「反骨」的報告呈交

者之間的數字差距就是中國巨大冤獄與死亡人口的來源。丁抒，「中國土改七十年來的『階級劃分』政策的惡意、隨意性及其後果（下）」，《華夏文摘》第1206期，2020年1月7日，收錄於文革博物館通訊（1038期）。<http://www.cnd.org/cr/ZK20/cr1038.gb.html>。

⁴ 「四清運動」於1965年就基本結束，常被外界視為是後來文化大革命的預演。「四清運動」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城鄉地區，在兩年內造成了大量產生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導致人員的「非正常死亡」，例如被虐致死或自殺等，根據有限的相關研究檔案，運動期間估計有超過7萬人被逼死、5百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相對來說，「一個也不殺」的「楓橋經驗」當然就變得非常突出。丁抒（2020）。

⁵ 梁書瑗，「近期上海防疫政策演變之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2022年4月22日。<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1885&pid=2077&typeid=3>。

到毛澤東的桌上，當時負責草擬「四清運動」文件與重要日常工作的彭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可能是幕後的關鍵人物之一。1963年11月毛澤東在閱讀報告與當地考察之後，指示謝富治（公安部部長）與彭真將楓橋區的經驗作為成功典型加以推廣⁶。但顯然毛是把「楓橋經驗」當成一種類似「引蛇出洞」的權力鬥爭工具，目標是劉少奇之類的黨內實力人物，而非真正的改革理念；不到三年之後，「四人幫」在毛的授意之下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個遭殃的就是「楓橋經驗」改革對象的公檢法系統、與支持這個改革的中央官員。

在1965年12月文革爆發前夕，毛在上海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突然發動對羅瑞卿的嚴厲批判。羅是中共建政後的第一任公安部長，從1959年起，就被提拔重用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秘書長、以及中央書記處書記，是黨內「刀把子」的第一把手。會議撤銷羅的所有職務，等於成功地制服黨內最有可能破壞毛接下來大計的人物，而負責修理羅與公檢法系統的就是謝富治與毛「最親密的戰友」林彪，製造了中共黨史上知名的「彭、羅、陸、楊集團案」，在1966年5月將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高級幹部一起打成「陰謀反黨集團」。其中謝富治負責實際執行「砸爛公檢法」的任務，他在1966年8月7日在公安部全體幹部大會上作出講話，全面否定建政以來公檢法的工作，指各地的公檢法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公安部幹部就成了第一大的鬥爭目標，九名公安部部長和副部長被打倒，其中一人被逼自殺未遂，一人被認定「畏罪自殺」，兩人被「保護審查」，五人被關進秦城監獄。「地下黑公安部」的羅瑞卿則在跳樓自殺未遂之後，於1966年12月20日深夜，被紅衛兵拖出家中，綁到北京郊外的一個解放軍部隊駐地，在林彪的監管下經歷了長達7年的屈辱生活⁸。

改革開放之後，「砸爛公檢法」式的「楓橋經驗」，群眾路線被替換成警民合作的形式，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之名發展成以公安部為核心、「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人民群眾的力量」結合的一種運

⁶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愛思想》.[2019-11-20]

⁷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048。

⁸ 王友群：「九名公安部部長副部長文革倒大黴」，《大紀元》，2023年11月17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1/16/n14117417.htm>。

動式維穩模式，「綜合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通過加強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實現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1991 年中共中央並成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綜治委），成為江澤民時代後主管維穩的中央機構，協調包括公安部、商業部、文化部、衛生部、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等牽涉社會管理的部門，直到 2018 年《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後併入中央政法委員會⁹。

習近平與「楓橋經驗」的連結很深，可以追溯到 2002 年習近平從福建省調任浙江省後立即赴楓橋調研的表態，而當時高舉的「新楓橋經驗」是以建立自派出所到群眾家門口的聯絡線為主要作法，將整個村鎮分為 3 個警務站、共 12 位公安管理，28 個村建立警務點，由各村「平安專管員」與「調解員」負責處理群體性事件，減少派出公安鎮暴的必要，即是所謂的「矛盾不上交」。但是這個模式顯然存在與毛時代版本一樣的問題：「矛盾不上交」是因為人民被基層治理者壓制而不上報（吃案）、或是兩者達成共謀而不上報（腐敗）？尤其當基層治理者常常是問題的共犯甚至是主體的情形下（例如暴力拆遷），「平安專管員」與「調解員」是否還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更為可怕的是，為了不上交造成高層的麻煩，是否會演變出更多地方「私刑」式的違法關押、或是流氓/暴民式的維穩作為更為平常¹⁰？

（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時期的「朝陽群眾」、「西城大媽」和「海淀網友」

習近平執政後，對於公安部主管的維穩事務要求越來越大，其中以群眾監管群眾的這種「新楓橋經驗」形式被許多人推崇為解決之道。日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上會見百名「楓橋式工作法」的單位代表，這些人其實就是一般民間調解、社區服務、以及志願服務的工作者，推行所謂的「楓橋式工作法」，從受訪人物的背景來看，「楓橋經驗」

⁹ 王韻、王占璽、曾偉峯、蔡文軒，「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發展及中共維穩作為」，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政策報告 NO108001，2019 年 4 月。

¹⁰ 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遭遇就是明顯的例子。Chen Guangcheng, *The Barefoot Lawyer: A Blind Man's Fight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n China* (New York: Picador, 2015)。

核心就在於「群眾管理群眾紛爭」，這種與民合作的路線正面來看是打擊犯罪的警民合作，但負面來看就是打壓異己的「維穩 2.0」。中國大陸學者胡潔人認為包含司法機關、行政部門與群眾組織的「大調解」機制可以充當社會衝突的「過濾器」與「減震器」，但她也承認當一黨制不可挑戰、三權分立不被允許、多元的社會組織無法健康存在的情況之下，這個機制離「真正意義上的大調解」仍有一段距離；外界看到的更多是這些基層「群眾組織」反而成為監視、打壓與迫害「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社群）與「高級黑」（社會菁英）的第一線工具¹¹。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習式的「楓橋式工作法」比較接近要群眾檢舉群眾的「維穩 2.0」。其中最知名的例子就是要民眾舉報行為不檢名人的「朝陽群眾」模式。「朝陽群眾」一詞始於 2013 年 8 月，北京公安在逮捕「網絡大 V」薛蠻子的公開消息中指出，逮捕薛蠻子是因為「朝陽群眾」對其賣淫嫖娼行為的舉報，被網友戲稱「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的「朝陽群眾」，至此成為公安線民的代名詞，無獨有偶，2014 年在外國人與名人聚居的北京朝陽區發生多起吸毒舉報事件，因此北京市公安局也開始利用這個「民氣」來打擊犯罪，例如在官方微博上刻意使用「朝陽群眾」一詞，並在 2017 年 2 月推出「朝陽群眾 APP」，民眾可以直接利用該手機程式對遺失招領、肇事違章、老人丟失、疑似嫌犯和兒童拐賣等問題上傳影片、照片和文字進行實名舉報。2015 年 6 月 3 日《人民法院報》發表評論，稱「健全公共安全體系、編織公共安全網，就需要樹立人人都是『朝陽群眾』、個個爭當『朝陽群眾』的參與意識，拓展各界群眾對公共安全治理的參與力度」¹²。

根據《北京青年報》實地考察的報導，「朝陽群眾」包含在一個社區中以「黨員巡邏隊」串起來的職業基層工作者與志願者。一個樣板社區裡有大約 120 人的「黨員巡邏隊」、70 到 80 人的專職巡邏保全員、200 餘名「治安志願者」，300 餘名義務巡邏員、以及 200 多名「治保積極分子」；這支將近 900 人的基層治安大軍中，可能是戴著紅袖

¹¹ 同上註。王韻、王占璽、曾偉峯、蔡文軒（2019）。

¹² 「朝陽群眾」讓公共安全網更密實。人民法院報。2015 年 6 月 3 日 [2015 年 6 月 18 日]。

標的熱心居民，小賣部的店主，賣菜的阿婆、大樹下聊天的阿公、跳廣場舞的大媽，構築了一個綿密的監視與舉報的網絡¹³。「海淀網友」則是北京公安局對熱衷網路舉報的「小粉紅」起的一個外號，因為海淀區大學雲集，包含北大與清華近 60 所大學集中在此處，再加上中關村科技園區和海淀新區科技創新中心兩大創新園區，招募網路志願者效果顯著，海淀公安分局還特別設立官方微博「海小博」和微信服務號「海小薇」與網粉互動。根據官方的宣傳，2015 年 8 月份以來，海淀警方對 3,000 餘名「海淀網友」發放了 150 萬元獎金¹⁴。

目前全國各地都有類似的活動與以「楓橋工作」為名的「民間組織」成立，「百萬警進千萬家」、「義警」、「小巷管家」、「紅袖標」等治安志願者組織在大小城市街頭都可以看見；街道辦、國營企業、電力與水利服務等機構推出各種民眾申訴與調解的辦公室，也被標榜為「楓橋式工作」¹⁵。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濤 2019 年 11 月 19 日對外公開表示，「現在北京有這樣的說法，『朝陽群眾』、『西城大媽』和『海淀網友』在社會治理和治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我相信中國這樣的情況在很多國家是沒有的，這些做法很管用」¹⁶。一份名為「北京市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專項行動實施方案」的文件，要求到 2023 年之前，北京市要「逐步實現城市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 15 個社區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 8 個」；文件要求每個社區要培育至少 2 個像「西城大媽」、「朝陽群眾」、「石景山老街坊」等「品牌」社區組織。除了「維穩 2.0」的目的之外，「楓橋式工作」廣義來說也是黨透過購買社會服務與組織志願者隊伍，把手伸進基層社區，進一步建立一個不同於西方模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¹⁷。

¹³ 「揭秘北京朝陽群眾：由五股力量構成 身影隨處可見」，《北京青年報》，2015 年 6 月 1 日（轉載於「北京『朝陽群眾』到底是誰：謎底終於揭開」，《網易娛樂》，2015-06-11 <https://www.163.com/ent/article/ARQIEHUS00031H2L.html>）。

¹⁴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6%B5%B7%E6%B7%80%E7%B6%B2%E5%8F%8B>

¹⁵ 穎達，「理響中國：堅持好、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2023-11-17。
<https://www.dswxyjy.org.cn/BIG5/n1/2023/1120/c457734-40122057.html>

¹⁶ 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國不會把自身制度強行推薦給別國」，《中新社》，2019 年 11 月 21 日；「中國為什麼有『朝陽群眾』『西城大媽』？」，《人民網》，2019 年 10 月 28 日。

¹⁷ 「中國觀察：揭京城神秘組織『朝陽群眾』」，《大紀元》，2021 年 11 月 20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11/20/n13387404.htm>

(四) 習近平「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實踐

「楓橋工作」從毛時代的「引蛇出洞」、改革開放時期的警民連線、「維穩 2.0」到強調全方位「具有中國特色的市民社會」，這個工作的發展實踐體現了習近平時期權力集中以及凡是講求「底線意識」的政治思維，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但這個中國共產黨一手建立的「官辦」市民社會，對黨中央的忠誠是毫無疑問了，但「管用」嗎？能夠預防中央擔心的「顏色革命」嗎？

「朝陽群眾」這種本質是獎勵社區大爺與大媽多管閒事的工作，對於像是舉報李雲迪涉性交易、或是柯震東和房祖名吸毒等單純治安事件的效果顯著，對於驅逐躲在小區大樓裡聚會的家庭教會，大概也有很高的嚇阻力，要與派出所合作監控異議人士大概也不會有太多困難，但這些工作胡溫時期就已經在做了，不需要中央大張旗鼓的推廣就已經成形，習近平的「新時代楓橋經驗」，其實缺乏工作手法與策略上真正的創新，最多是推廣力度與投入資源上的大幅度增加，但一個社區就要「雇用」近千名的「志願者」（雖名為志願，但政府仍需要投入從辦公室租金、餐費、獎金等工作費用）的這種模式，到底「性價比」符不符合期待，非常值得懷疑。

這些疑問還需要更多的資料與研究才能解答，筆者只能從幾件近期的事例來看，這一套「楓橋式工作」模式花下巨大的成本，卻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滴水不漏與無所不知。疫情期間中國無所不在的防疫人員「大白」，其中除了部分醫療人員、專業採檢人員、以及公安之外，多數屬於地方政府雇用的城管、臨時工作人員與社區招募的志工，很多是被動員展現先進性的黨員幹部、以及早就在治安網絡中的社區大媽大爺，負責在社區與住宅區外圍管制出入、配合檢疫作為、以及檢舉違反封控作為的人事，等於就是「朝陽群眾」模式的全中國尺寸放大版¹⁸。但從外界最多報導的上海封城期間的經驗來看，社區大白們不但無法掌握缺糧的情況，與協調各種民眾購物或就醫等等的需求，反而因為過於僵硬地執行封控的命令，而被市民們普遍地厭惡；國際

¹⁸ 「決戰疫情防控，黨員盡銳出戰！市殘聯系統黨員幹部積極響應號召投身社區防控」，
《人民網上海頻道》2022年03月31日。
<http://sh.people.com.cn/BIG5/n2/2022/0331/c134768-35202226.html>

大都會有人餓死的責任，雖然不能完全算到大白們的身上，但無力或無能掌握弱勢住戶的狀況，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¹⁹，全國範圍內大白與市民的衝突的消息，頻繁地出現在社群媒體版面當中：有大白強行進入確診者家中消毒，偷竊私人的貴重物品；有寵物因主人被確診無人照顧遭大白棍棒毆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間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髮、毆打、甚至被以鐵鍊封門；賄賂或是透過私人關係打通大白、甚至取得一套防護服的而能暢行無阻的消息，更是讓一般人憤怒²⁰。

而監控外國使館、KTV、酒吧、夜店以及眾娛樂場所出名的「某某群眾」，或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外地人的厲害「某某大媽」，從導致清零政策結束的 A4 白紙運動、到解封之後第一個西洋萬聖節，強大的「楓橋式工作法」對於年輕人展現明顯的不滿與批判現狀的行動，卻似乎變得軟弱與無聲。面對上海萬聖節遊行中穿著做核酸檢測的「大白」；帶著韭菜與股票指數海報的「被割韭菜」族；頭戴類似 CCTV 監控鏡頭諷刺「監控大國」的參與者；大批年輕人身穿各種創意且諷刺的服飾在上海巨鹿路狂歡的照片和影片，在今年 11 月席捲了中國與海外社交媒體，連一向對於西方影響力不假詞色的官媒評論員胡錫進，都呼籲考慮上海人在過去這段期間吃的苦，社會應該「多給年輕人一些無拘無束的空間」²¹。

從這些事例可以大致看得到，傳統人盯人的「楓橋式工作法」配合上高科技執法的現代維穩機器雖然強大，但也無法完全壓制根植於人性的普遍需求；人民要工作、要溫飽、要健康、要平等、要公道的普遍需要必須被滿足，然後這些監控的工具才會發生作用，因為與胡錫進一樣，這些街坊社區的工作者都是中共改革開放下最大的受益者，關心的首先是自身利益的持續、然後才是社會穩定的發展。剩下的問題是，習近平的「新時代楓橋經驗」要的真的只是「維穩 2.0」嗎？還是他也跟毛澤東一樣，對於「楓橋經驗」另有權力鬥爭的打算？這些問題都有待時間去解答。

¹⁹ 「討物資與『大白』爆衝突？上海官方：蠱惑滋事」，《德國之聲》2022 年 5 月 9 日。

²⁰ 「誰是大白：從暖心大白到『白色恐怖』，防疫權力將伸向何方？」，《端傳媒》，2022-09-08。

²¹ 《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7283168>。

七、中共航天科技發展情形與軍事意涵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荊元宙主稿

- 中共目前已將衛星互聯網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性工程，在與遙感、導航系統整合之後，可成為空地一體化資訊系統，此基礎建設正為現代化戰爭中 C4ISR 及長程精準打擊能力的有力支撐。
- 有人員常駐的太空站可以成為輔助地面指管中心的太空作戰指揮中心，即時操控衛星網絡，有利於執行聯合作戰；若加裝定向能武器和電磁武器，亦可執行反導彈或反衛星操作。
- 嫦娥 5 號返程時使用「打水漂」的方式重返大氣層，與東風 17 導彈可能使用所謂「錢學森彈道」類似，由於此種飛行路徑與傳統彈道飛彈軌跡不同，路徑難以預測自然難以攔截。

（一）前言

中共在建政初期，整個國家體質極為貧弱，但毛澤東仍決定發展所謂「二彈一星」的核武及太空衛星科技，雖然毛清楚瞭解此皆為燒錢的項目，但基於整體國家安全考量，仍勉力為之。目前中共經濟發展已有一定水準，自然有條件繼續發展太空科技（中共方面習慣以航天科技稱之）。太空科技具有軍民兩用的特性，因此太空科技的發展已不僅是滿足人類探索太空的需要，同時更包含著使太空成為戰爭領域的高度可能。

對中共而言，太空軍事能力正是其在面對與美國的不對稱戰爭中，縮短彼此實力差距的「殺手鐮」手段。因此中共雖然口頭上仍不斷宣稱反對太空軍事化的發展，但是中共的太空活動是由中央軍委所屬戰略支援部隊所主導，要撇清太空活動與軍事化無關，是無稽之談。其目前所擁有的太空科技應該已經直接或間接使用於軍事用途之上，因此各界對中共太空科技的發展莫不抱持極大關注及猜疑。在中共已成為地區強大不安來源的狀況下，其太空科技的發展進程以及在軍事上的意涵無疑是一個對區域安全影響甚鉅的議題，值得關心探討。

（二）近期中共的太空活動

由於中共航天技術涵括甚廣，考量篇幅限制無法一一述及，本文僅針對深空探測等幾項重要活動進行說明。

1. 深空探測

根據《國務院關於印發「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的通知》，中共計劃於 2018 年發射嫦娥 4 號，實施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降落實驗探測。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 4 號探測器成功登陸月球，中共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登陸月球背面的國家；隨後，嫦娥 5 號成功帶回月球土壤樣本；中共目前亦計劃在 2030 年完成載人登月任務。月球探測的主要目的在開發月球上的資源，因為這些資源將有利於中共的經濟及科研發展。此外，「祝融號」於 2021 年 5 月登陸火星，使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第二個成功將探測車輛送上火星的國家，下一個目標是將人類送上火星。

2. 國際太空站

中共太空站也稱為「921 工程」，是中共載人航太工程（CMS）三步驟走發展策略的最後一步。因為美國反對中共參與「國際太空站」計畫，反促使中共自力打造稱為「天宮」的中國太空站，目前中共太空人已可利用神舟太空船輪番交替進駐「天宮」，顯示其載人航天技術已經成熟。2022 年 11 月，天宮太空站基本建設完成，使中國成為繼前蘇聯、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三個建成低地軌道（LEO）太空站的國家。目前「天宮」是「國際太空站」之外唯一的太空站，且由於國際太空站預計將於 2030 年除役，其後「天宮」將成為地球軌道上唯一載人太空站。

3. 北斗衛星系統

中共於 1994 年啟動北斗 1 號衛星導航系統建設，其後北斗 3 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於 2020 年 7 月全面投入運作，北斗衛星導航系統與美國的 GPS、俄羅斯的 GLONASS 和歐盟的 Galileo 並列全球四大導航系統。目前北斗系統已通過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驗證，正式成為全球民航通用的衛星導航系統，這意味著中共的軍、民用導航需求已徹底擺脫對西方的依賴，同時還可用來協助支援「一帶一路」計

畫的工程需求。

4. 衛星網路

俄烏戰爭中馬斯克（Elon Musk）所擁有的星鏈（Starlink）低軌衛星系統對烏克蘭維持通信能力發揮極大助益，突顯低軌衛星星座的重要性。中共也看到了此一趨勢，不論是為了未來可能的臺海戰爭軍事準備，或為避免太空軌道資源遭西方壟斷，中國刻正加快速度建設中國版星鏈系統。2020 年 4 月，中共將衛星互聯網納入「新基建」範圍，目前低軌衛星星座計畫主要包括鴻雁星座、行雲工程、虹雲工程、天象星座等。中國的天兵科技公司正試圖研發與 SpaceX「獵鷹 9 號」（Falcon 9）相當，單次發射就能部署最多 60 枚衛星的火箭，並朝向製造出可重複使用的火箭邁進，以利降低建設成本。

中國近年太空發展進程表

DATE	ADVANCEMENT
2012 年 6 月 18 日	神舟 9 號太空艙與在軌天宮 1 號實驗室接合，完成首次載人太空對接。
2013 年 12 月 14 日	嫦娥 3 號探測器登陸月球，並部署玉兔號月球車。
2016 年 9 月 15 日	發射天宮 2 號在軌實驗室取代天宮 1 號
2018 年 4 月 1 日	天宮 1 號被拋棄並失去控制，在返回進入地球大氣層後墜毀至南太平洋。
2019 年 1 月 3 日	嫦娥 4 號成為第一個在月球背面軟著陸的太空艙
2020 年 7 月 31 日	宣布啟用北斗 3 號，為中共和其他國家客戶提供類似 GPS 的全球衛星導航服務。
2020 年 12 月 17 日	嫦娥 5 號攜帶月球土壤樣本返回地球
2021 年 5 月 15 日	天問 1 號攜帶祝融號降落於火星，完成首次登陸火星。
2021 年 6 月 16 日	三名太空人搭乘神舟 12 號至天宮太空站與天和太空艙會合
2021 年 10 月 14 日	發射羲和衛星對太陽進行觀測
2022 年 7 月 24 日	發射問天太空艙，為天宮太空站的第二個模組
2022 年 10 月 31 日	發射夢天太空艙，為天宮太空站的第三個模組，至此天宮太空站建設完畢。
2022 年 11 月 29 日	神舟 15 號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升空，搭載三名太空人前往已建成的天宮太空站。
2023 年 5 月 30 日	神舟 16 號太空船升空，接替神舟 15 號。
2023 年 10 月 26 日	神舟 17 號太空船升空，接替神舟 16 號。

資料來源：

Li You, "A Timeline of China's Advancements in Spaceflight," *The New York Times*, Dec. 12,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2/science/china-space-chronology-timeline.html>

(三) 軍事意涵

1. 中共衛星建設有助於其 C4ISR 及長程精準打擊能力

中共在衛星科技的發展上是全方位的，不論通信、中繼、導航、偵察、監視及氣象各方面都有著大幅進步。中共目前已將衛星互聯網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性工程，在與遙感、導航系統整合之後，可成為空地一體化資訊系統，此基礎建設正是現代化戰爭中 C4ISR 及長程精準打擊能力的有力支撐。

在導航衛星方面，未來北斗系統可因應智能化戰爭之趨勢，成為「人機協同」抑或無人載臺聯合作戰之基礎。中共北斗系統結合其知名無人機大廠「大疆」公司等無人機產業會出現何種軍事利用上的發展，值得觀察。

此外，中共若使用低軌衛星星座同時搭載光學觀測載荷，基於其距地距離近、高重訪率的優勢，將可對特定地區實現 24 小時不間斷密接監控。

2. 太空站可成為太空作戰指揮中心

依照中共官方說法，天宮太空站的任務主要在於擔任國家級太空實驗室和國際科技合作交流平臺，從事多領域太空科學實驗與技術試驗。但是若考慮到軍事用途，有人員常駐的太空站可以成為輔助地面指揮中心的太空作戰指揮中心，即時操控衛星網絡，有利於執行聯合作戰。若加裝定向能武器和電磁武器，亦可執行反導彈或反衛星操作。

天宮太空站的機械手臂具有視覺辨識和人工智慧能力，另外根據報導，新發展的「實踐-21 號」衛星亦具有捕捉報廢的北斗導航衛星的能力，這些事實顯示出中共已具備在太空中靈活使用機械臂之能力，在美國《2022 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即認為此類科技在未來可用於捕捉其他國家衛星，成為中共反衛星能力之一。

3. 中共強化導彈控制能力造成反導困難

神舟系列太空船及嫦娥 5 號的返回艙穿越大氣層返回地球後，儘管返回艙外部焦黑，但內部完好無損，顯示中國防熱技術之進步。另外，嫦娥 5 號的返程甚至是使用「打水漂」的方式，實施半彈道跳躍

式再入重返大氣層，此與東風 17 導彈可能使用所謂「錢學森彈道」類似，顯示中共似乎已有能力控制彈道飛彈重返大氣層的姿態及重入速度。由於此種飛行路徑與傳統彈道飛彈所使用的拋物線軌跡不同，路徑難以預測，自然難以攔截。若將嫦娥 5 號遙控制導及動力系統應用於導彈研製，將增加飛彈防禦系統的困難。

（四）結語

根據美國 2022 年度《太空工業基礎現狀》報告表示，中國致力於在 2045 年成為佔據太空主導地位的大國；如果美國安於現狀、缺乏緊急行動，可能會在未來十年內或者 2032 年之前失去對中共的太空優勢。因此在中美陷入全方位對抗格局下，太空已無可避免成為軍事鬥爭領域，因而相關系統載臺的軍備競賽勢必難免，太空軍事化甚至武器化的趨勢將持續進行。

另外，過去我們認為美國因為過於依賴衛星的功能而成為其防衛上軟肋，因而有所謂「點穴戰」之類不對稱作戰戰術戰法出現；然而目前的狀況是，中共太空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得其也開始如同美國一樣大量依賴太空載臺，因此在太空領域中美雙方逐漸形成了對稱作戰之勢，雙方攻守競爭因而更加激烈複雜。

八、「兩岸企業家峰會」與中共促統促融作為觀察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曾于蓁主稿

- 「峰會」聚焦高技術產業合作推進高質量發展，建立產業交流對接平臺和促進產業（供應）鏈融合。
- 在陸臺商欲融入大陸內需市場仍面臨不熟悉營運邏輯、欠缺人才和同等待遇未落實等障礙。
- 中共終止部分產品試用 ECFA 稅率，或為促臺相關產業進一步融入中國大陸，後續或推出政策促進兩岸供應鏈融合。

（一）前言

「兩岸企業家峰會」2023 年 11 月 14 至 15 日於南京召開，以「新格局中融合發展與高質量發展」主題，探討兩岸企業家如何把握新發展格局，推動臺企融入大陸內需市場，深化兩岸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其中，最核心的關鍵字是「融合」。這次峰會是兩岸企業家峰會的第十週年，首次在峰會永久會址舉辦；並在中共中央於 9 月 12 日公布官方第一份專門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所印發的文件——《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後舉辦之大型兩岸企業論壇。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次峰會可視為是官方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而實際推動的行動，是就該文件的實質「促融」舉措。

王滄寧在企業家峰會致詞中以兩岸皆面臨「問題」做為楔子，期望臺陸雙方可以搭載兩岸經濟產業合作的橋，以利兩岸和平發展道路。這裡所指的「問題」，在陸方體現的是美中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大陸內部產業和消費等各層面，急需臺資幫忙拉振經濟；對於在陸臺企方面，則是面臨外需萎縮，有必要拓展大陸內需市場，但企業面臨產業轉型以及融入中國內需市場之現實困難與問題，需要中國官方釋出資源幫忙建立臺陸產業合作平臺。因此，此次的兩岸企業家峰會，即是為了解決雙方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是藉此機會讓臺商成為兩岸融合發展之助力。

（二）企業家峰會要況

本次兩岸企業家峰會的討論，基本上皆是透過閉門會議進行，外界僅能透過事後的媒體報導窺知一二。透過媒體資訊彙整重點如下：

1. 發展高質量技術產業合作

本次會議反覆出現「高質量」產業融合發展，如工總苗理事長發表專題演講時所言，過去臺灣視大陸為成本中心，但隨著大陸市場成長，以及區域經濟整合下將擁有更大市場，臺商可以與大陸攜手「賺全世界的錢」，大陸將逐漸成為臺商的利潤中心；另一個方向，是高質量發展，兩岸產業可以透過深化合作、共同研發，一起突破關鍵零組件製造等被「卡脖子」的瓶頸。臺灣方面理事長劉兆玄亦指出，臺灣在高端零組件、智慧裝備和整合系統的研發生產方面已經取得了可觀的成績和經驗；此外，大陸從臺灣進口了大量優質的電子零配件，成功融入供應鏈，雙方在這方面未來可望擴大貿易交流。兩岸未來可合作的潛力產業包括了先進製造業、新一代移動通訊、工業互聯網、元宇宙、節能環保、現代服務業等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的共同特點在於都屬於高質量技術產業。

2. 促進產業交流對接平臺

峰會設有官網，依據該官網的組織架構除「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組」外，還設有「能源及環保節能產業合作推進小組」、「智慧製造及裝備產業合作推進小組」、「資訊產業合作推進小組」、「中小企業合作及青年創業推進小組」、「金融產業合作推進小組」、「現代服務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合作推進小組」、「生物科技與健康照護產業合作推進小組」等8個小組，可看出兩岸企業家峰會平臺規劃的兩岸重點合作項目。此外，此次峰會的「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組」分別針對「精密製造交流對接」、「醫療健康交流對接」、「臺博會交流對接」等主題進行討論，會後並就重點項目簽約。不過，簽約之相關內容在其官網或相關新聞媒體皆沒有公布，需要後續再持續觀察相關進展內容。另有臺商建議，可擴大舉辦東莞臺博會，打造其成為產業對接平臺，這將有助於在陸8萬家臺資企業拓展大陸市場。

3. 建立產業（供應）鏈融合

中國大陸方面的代表理事長郭金龍表示，大陸已經形成並正在不斷強化的超大規模市場，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是推動兩岸產業鏈供應鏈融合發展的關鍵。他對兩岸企業界喊話支持臺企融入大陸內需市場，支持兩岸企業攜手拓展國際市場，推動兩岸產業鏈供應鏈深度合作、融合發展，既有利於兩岸企業共同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複雜變化，又有利於臺企加快轉型升級、共享發展紅利。

我方峰會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組副召集人陳保基也表示，兩岸產業發展多時，各有所長，若兩岸能融合，就不用再從頭走起，可節省成本增加效益。我方代表焦佑倫也表示，大陸加上臺灣的產業鏈即是配合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包括歐美的大企業，兩岸提供相當多關鍵性的部件，促進很多國際企業的發展。希望在新形勢下，能更好的深化兩岸融合，推動兩岸企業對接，互利共榮。

（三）結語

1. 融入內需市場需克服幾座大山

首先，營商模式需適應與熟悉。多數在陸臺商長期以來是以外銷為主，對於內需市場的營運邏輯並不若在地陸商來的靈活接地氣，因此，儘管一些臺商已經開始發展大陸在地營銷體系，但欠缺人脈網絡、人才團隊以及市場通路，導致整體生產成本高昂。其次，中國大陸在政策上仍有許多進入障礙的法規或制度，還沒有做到真正的同等待遇。劉兆玄指出，北京在政策上雖給予臺商「內資待遇」，但在實務上臺商仍被視為外資。根據實務經驗，過去幾年來儘管中國大陸已經四度推出所謂的「惠臺措施」，然而，較多的是政策拉攏的宣示效果，許多政策相應的配套細節並不完整，尤其是在法令方面，形成一種加入大陸市場的隱性壁壘，難以真正和陸資企業公平競爭。這樣在政策上雖給予臺商優惠措施，甚至宣稱將和內資之同等待遇，但在實務上臺商仍被視為外資，令臺商無所適從。另外，臺灣工商團體也曾多次建議陸方將各項惠臺措施明確納入《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之中，呼籲大陸方面能予以考慮，可見在投資保護層面仍有不足之處。

2. ECFA 明年將中止部分產品關稅減讓

中共在 2023 年底公告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對原產於臺灣的丙烯、二甲苯等 12 個稅目進口產品，將中止適用 ECFA 協定稅率。這個決定與本次兩岸企業家峰會之臺灣方面的期待背道而馳，相信與會者皆會大感驚訝，因為在峰會中已有明確呼籲中止 ECFA 對於臺灣產業有嚴重的影響，將導致企業將把產線加速從臺灣外移到第三地或是轉移到中國大陸以求生存。部分學者認為 ECFA 做為經濟制裁手段目的在於強迫臺灣打開市場，但從中共推動融合發展的角度而言，促使臺灣內部重要產業出走、靠攏甚至融入中國大陸市場，或許是更為有效經濟融合之作為，可預期的是中國大陸將釋出更多政策去整合兩岸供應鏈建立產業融合，不僅企有益於其自身經濟發展，亦有對臺促融促統之政治經濟雙重目的。